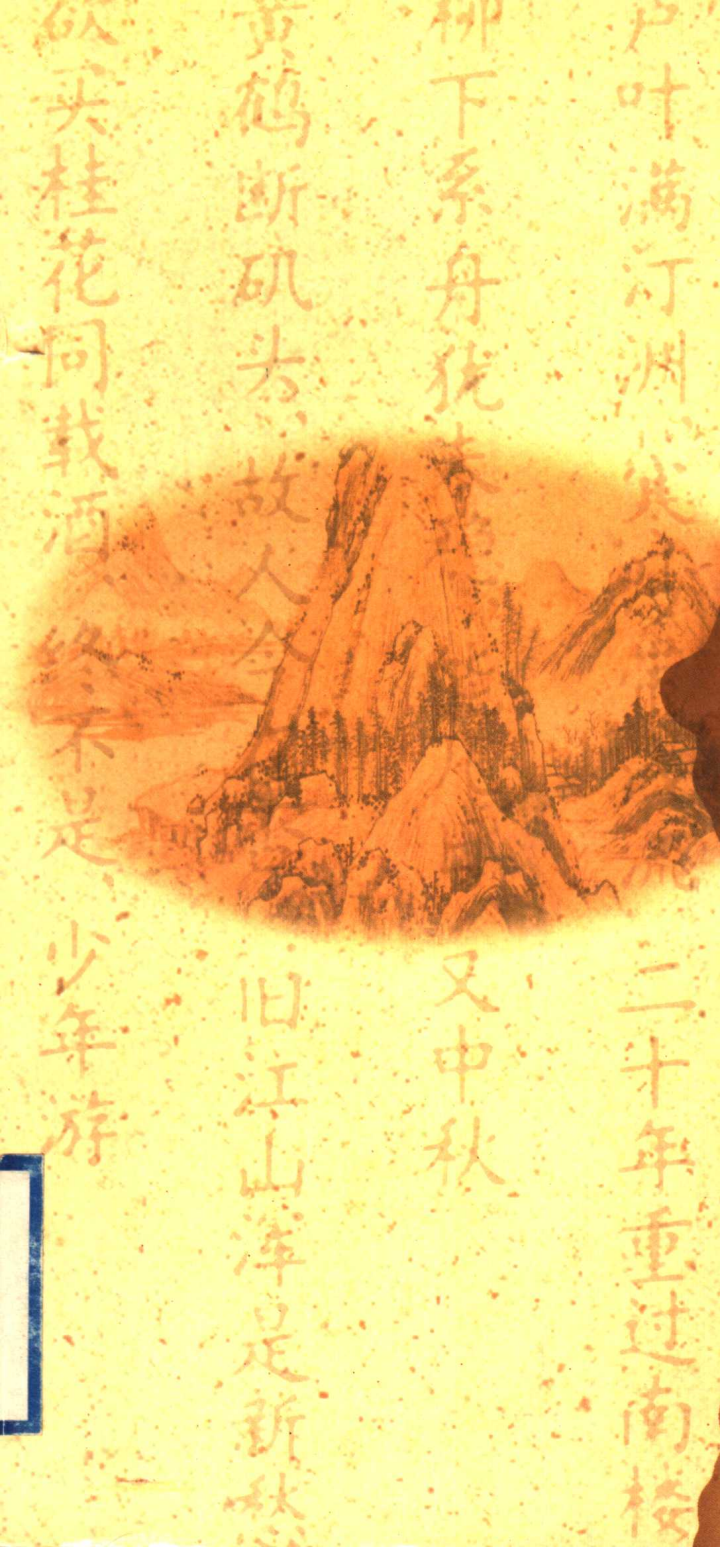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

龙洲词校笺

马兴荣 / 著



龙洲词校笺

马兴荣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洲词校笺/马兴荣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9

ISBN 7-210-02014-4

I . 龙…

II . 马…

III . 古代作品 - 中国文学 - 宋词

IV . I222

龙洲词校笺

马兴荣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南昌红十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3.875

字数:140千 印数1-1200册

ISBN 7-210-02014-4/I·374 定价:8.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江苏昆山市刘龙洲墓

前 言

南宋时期，腐朽的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偏安的局面，向金称臣道藩，献地纳银；而广大人民和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都力主抵抗侵略，收复失地，统一祖国。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反映在南宋词坛上，就出现了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他们继承了北宋苏轼的豪放词风，以悲壮激昂的歌声，唱出了抗敌御侮、收复失地的时代精神。这些词人中著名的，在辛弃疾之前有张元幹，跟辛弃疾前后同时的有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在辛弃疾之后的有刘克庄、刘辰翁等。这些爱国词人和他们的作品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特别是像以词著名，在推动豪放词的发展中起过一定作用的刘过，更值得我们注意。

—

刘过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庐陵（治今江西吉安市）人；一说是太和人^{〔1〕}。按，庐陵，郡名；太和，其属县也。另一说是襄阳人^{〔2〕}。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虽然刘过自己在《襄阳歌》中说过：“十年著脚走四方，胡不归来兮襄阳。”但是这只能说明他曾不止一次到过襄阳，并没有说襄阳是他的故乡。而且他在《和刘叔拟》诗中说：“百年为客老，一念爱乡深。草露青原泪，烟波白鹭心。班超归未得，想见旧家林。”诗下自注说：“庐陵有青原山、白鹭洲。”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他是庐陵人了。另外，岳珂的《桎史》、杨维桢的《宋龙洲先生刘公墓表》、殷奎的《复刘改之先生墓事状》也都说刘过是庐陵人。可见说刘过是襄阳人的说法是错误的。

关于刘过的生卒年，罗振常在《订补怀贤录》按语中说：

龙洲事迹，诸书所载略备，惟生卒年与存年无及之者。考《万

历《崑山志》称祠建于宋嘉定五年，即龙洲葬年也；殷奎《复墓事状》则谓没后七年始葬。以推之，其卒年当在开禧二年。又读陈谔《题墓》诗，知龙洲卒年五十三，由开禧二年上溯五十三年，则龙洲实生于绍兴二十四年甲戌也。

这一段按语中谈刘过的葬年、卒年，都是比较可信的。因为除了罗振常在按语中所引的材料以外，王鏊的《姑苏志·冢墓志》说：

刘过墓在崑山县马鞍山。嘉定五年，令潘友文、簿赵希楸葬。

岳珂在《桎史》卷二中说：

庐陵刘改之（过）以诗鸣江西，厄于韦布，放浪荆楚，客食诸侯间，开禧乙丑过京口，余为饷幕庾吏，因识焉。……既而别去，如崑山，大姓董氏者爱之，女焉。余未及瓜而闻其讣。

刘过在《八声甘州》（问紫崑去后）下自注云：“送湖北招抚吴猎”。查魏了翁《吴猎行状》，吴猎是开禧元年（1205年）十二月知江陵府，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公事的。从上述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刘过的葬年是嘉定五年（1212年），卒年是开禧二年（1206年）的说法是可信的。但是，罗振常仅仅根据明代陈谔《题刘龙洲、易莲峰二公墓》诗中的：“同是庐陵士，皆年五十三”的句子，就确定从刘过的卒年开禧二年倒推上去五十三年（1154年）是刘过的生年。这就有点问题了，早于陈谔的元朝人王公辅在《祭刘龙洲先生文》中说：“天靳斯文，五十而殒。”另一个元朝人袁华在《复龙洲刘先生墓诗》中也说：“五十死无嗣。”可见刘过生于绍兴二十四年的说法是不完全可靠的。当然，两位诗人诗中的“五十”，可能是举其成数而言，但也可能是实指。所以我觉得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我们只能说：刘过约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之间。

刘过出生不久，就碰上隆兴元年（1163年）北伐失利，金兵南

犯淮南，名将魏胜战死。宋孝宗派使者赴金求和，除已经放弃了的海、泗、邓、唐四州以外，再割让商州；金宋间称叔侄之国；“岁贡”改称“岁币”；银、绢比旧约各减五万。达成了所谓的“隆兴和议”。宋金对峙的局面从“绍兴和议”起就确定了，到这次“隆兴和议”就更加稳定了。南宋最高统治者还恬不知耻地说这种屈膝投降是：“志在好生，宁甘屈己，书币土地，一一曲从。”^[3]从此，他们把杭州当做乐园，沉醉在湖山之间，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根本不想恢复中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宋弄到像朱熹所说的：“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外有强暴之夷，内有愁怨之军民，其他难言之患，隐于耳目之所不加、思虑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间，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何可胜数。”^[4]刘过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统治者醉生梦死的时代。

刘过出身贫寒，吕大中《宋诗人刘君墓碑》说他“家徒壁立，无担石储”。但自幼好学，曾遍读经、史及诸子百家之文。好饮酒，喜谈兵，睥睨古今，傲视一世，以诗著名江西。这时虽然已经是“隆兴和议”之后了，但是，北宋的被颠覆，徽钦二帝的被俘北去，中原大好河山的被占领，这一件件奇耻巨辱仍旧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底。因此，他抱着“算整顿乾坤终有期”的坚强信念，以驱逐敌寇、恢复中原、洗雪国耻自期。他希望通过考试，得到重用，却屡试不第；他又上书当权者，力陈收复方略，谓中原可一战而取，也石沉大海，毫无消息。但刘过对此并不介意，他在《寄吕英父》诗中说：“文章已得真消息，三十科名未是迟。”又在《送王柬卿归天台》诗中说：“世事看来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于是，他便以杭州为中心，南下东阳、天台、明州，北上无锡、姑苏、金陵、盱眙等地漫游。在盱眙，他甚至想弃文就武，投笔从戎。他在《盱眙行》中说：“何不夜投将军扉，劝上征鞍鞭四夷。沧海可填山可移，男儿志气当如斯。”继后，他又从金陵溯江西上，经采石、池州、九江、武昌，直至当时的前线重镇襄阳。并往返武昌、襄阳之间。在襄阳时，他每登岷山，遥望中原，常常慷慨悲歌，歔歔流涕。

刘过这次西游，凭吊了虞允文大败金兵的采石，周瑜破曹的赤壁，武昌的黄鹄矶，岷山的堕泪碑等名胜古迹。他还接触了一些达官贵人和不少的地方官吏，希望得到一个有力人物的提拔，使

他能施展抱负。可是，时间像流水一样，转眼之间十年就过去了，而他还是没有得到一个盼望的机会。坚强、自信的刘过还是不甘心，仍然豪情满怀，他在《挂塔松窝》诗中说：“十年南北走东西，豪气峥嵘老不衰。”可是，现实也逐渐教育了他，使他清醒了一些，所以在寄给陆放翁的《水龙吟》里，他就曾悲愤地问道：“而今纵有，新诗冰柱，有知音否？”

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南宋小朝廷发生了一次政变。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赵汝愚和知阁门事韩侂胄合作，并取得太皇太后的同意，强迫光宗退位，拥立了赵扩(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韩侂胄把赵汝愚排挤出外，接着又把赵汝愚等五十九人列为“伪学逆党”，把这些反对他的力量，彻底清除掉，实际上掌握了南宋的政权。

这时，沦陷区人民在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下，在金统治者残酷压迫奴役下，日夜盼望南宋军队北伐，使他们重回祖国的怀抱。楼钥《攻媿集》卷一——《北行日记》就记载：“有其父囑之曰：我已矣，汝辈当见快活时，岂知耽搁了三四十年犹未得见。”不少人则早已奋起反抗了，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十九说：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山东、潞间，寇盗屯集至万余人”。而且，金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的矛盾也逐渐发展了，先后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互相残杀。可以说，北伐的客观条件确实是很好的。所以，韩侂胄也在各方面积极地为北伐做准备。他知道，要北伐首先必须团结南宋统治阶级的得力人物。因此，在嘉泰二年(1202年)二月，正式解除了“庆元党禁”，追复赵汝愚等人的官职。列名党禁的徐谊、刘光祖、薛叔似、叶适、项安世、吴猎等人也先后复官。另外一方面，他在军事上也作了全面布置，派程松为四川制置使，吴曦副之，并令吴曦为陕西、河东招抚使，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郭倪为镇江都统兼知扬州，又兼山东、京、洛招抚使，辛弃疾为浙东安抚使，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

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正月，韩侂胄定议伐金。这时，安丰守臣厉仲方上言：“淮北流民咸愿归附。”浙东安抚使辛弃疾也上言：“金国必亡，愿属大臣备兵，为仓卒应变之计。”邓友龙使金还，则言：“金有赂使夜来求见者，具言金国困弱，王师若来，势

如拉朽。”^[6]韩侂胄北伐之念遂更加坚定。

由于韩侂胄代表了南宋统治阶级的抗战派以及南宋人民和沦陷区人民抗金的要求，所以当他号召北伐时，统治阶级内部大多数人也是支持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二》中说：“北伐之举，宗社安危所系也，雷同相从，如出一口，而争之者不数人。”

刘过和辛弃疾、陆游一样，对韩侂胄的北伐主张，坚决支持，他先后为韩侂胄写了《沁园春》（玉带金鱼）、《满江红》（霜树啼鸦）、《水龙吟》（庆流阅古无穷）、《贺新郎》（倦舞轮袍后）、《西江月》（堂上谋臣尊俎）、《清平乐》（新来塞北）等六首词。词中把韩侂胄比做“擎天柱石”，比做周公、召公、伊尹、吕尚，说韩侂胄当权十年，整顿了乾坤。对韩侂胄充满推崇、激励。但是，他并没有受到韩侂胄的重视和任用。所以他在留别辛稼轩的《念奴娇》里，不禁痛苦地问道：“知音者少，算乾坤许多，著身何处？”的确，在偏安的南宋，天地虽大，却没有像他这样的爱国词人、像他这样的爱国志士的立身之所，更不要说能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人生行乐，且须痛饮莫辞杯。”^[7]他本来就喜欢饮酒，但过去是以酒助其豪气，现在则是“收敛平生，筹边胸次，以酒浇之。”^[8]是借酒浇愁了。他说他除了“买得狂名满世间”^[9]外，是“依然破帽老骑驴”^[10]。不过，他还是比较旷达，他在《水调歌头》（弓剑出榆塞）中就曾说过：“达则牙旗金甲，穷则蹇驴破帽，莫作两般看。”

开禧元年（1205年）春夏之交，刘过在镇江和岳珂、辛以初、黄几叔、王安世、王英伯等相聚了一段时间。一次他登上多景楼，看见金、焦两山峨峨对峙，茫茫大江滚滚东流时，半生飘零，壮志未酬，失地未复的万千愁恨一齐涌上心头，他不禁写下了《题润州多景楼》这首古诗，表达他盼望收复失地的爱国热情和怀才不遇的悲愤。又写了七律《登多景楼》，尖锐地斥责了南宋统治集团的屈节、求和政策。这时，他的朋友潘友文任崑山县令，他从镇江去崑山，并在崑山结了婚。不久，就病逝于崑山。这时是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

刘过逝世不久，投降派首领史弥远及投机分子李壁，在杨皇后支持下，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把韩侂胄杀害了，“开禧北伐”

也就随之烟消云散,南宋的历史又翻开了屈辱投降的一页。支持“开禧北伐”的辛弃疾被骂为“迎合开边”^{〔11〕},是“损晚节以规荣进”^{〔12〕};陆游的祠俸被剥夺了^{〔13〕},而且“见讥清议”^{〔14〕};刘过也被认为“观其词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15〕}。这就是说“支持韩侂胄开禧北伐”是错误的了。对以韩侂胄为首的“开禧北伐”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我觉得“开禧北伐”是失败了,但是不能因为它的结局是失败的,就否定它。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过:“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从这次战争的发动者南宋政权和汉民族来说,它是长期被金侵略,被金压迫的。韩侂胄北伐是为了收复失地,解放沦陷区各族人民,解除金的侵扰,反对民族侵略,反对民族压迫。因此,就它的性质来说,是进步的,是正义的。革命导师列宁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中也曾经指出过:“如果战争的‘真正实质’在于例如推翻异族压迫……那么,战争从被压迫国家或民族方面说来就是进步的。”即使如《宋史·韩侂胄传》所说“或劝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复之议兴”是可信的,也否定不了这次战争的正义性。总之,以韩侂胄为首的“开禧北伐”应该充分肯定,积极支持韩侂胄北伐的辛弃疾、陆游、刘过也应该充分肯定,因为他们是坚定地站在反侵略的前列的,他们都是爱国的。

刘过逝世二十多年后,南宋文坛上出现了江湖派,生当其时的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中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阊台郡县糊口耳。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其人,石屏亦其一也。”他把刘过也算在江湖派里。其实,刘过和那些江湖派中的“山人”、“名士”并不相同。首先,刘过一生奔走四方,不是为了糊口,也不完全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而是希望获得知己,使他能施展“斩楼兰”、“整顿乾坤”的抱负。其次,南宋当时面临着金的侵略威胁,“和”与“战”是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朝野始终贯穿着激烈的和、战两派的斗争。在这个有关国家民族前途的主要问题面前,刘过的态度是极其鲜明的,他力主抗金,收复失地。所以他虽然“十年南北走东西”,但他接触的著名人物如周必大、韩侂胄、辛弃疾、陆游、陈亮、吴玠、郭

倪、岳珂等都是主战派、不是投降派。对于当时一些著名的投降派，他和他们没有什么交往，更没有吹捧过他们。就这一点来说，刘过甚至比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还要强一些。陆游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崇敬的爱国诗人，他至死没有忘记收复失地，洗雪国耻。但是，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他也有认识模糊的地方，例如主和派首领汤思退曾经反对张浚北伐，而陆游是积极支持张浚北伐的，但在汤思退罢相知绍兴府的时候，陆游却在《送汤岐公镇会稽》诗中吹捧汤思退过去反对张浚用兵是“措置极雍容”，而且是“及今始大服，咨嗟到儿童。”当然，刘过也有他庸俗的一面，例如他在给周必大的诗《辞周丞相》中说：“太平宰相不收拾，老死山林无奈何。”为了求得一官半职，表现出一副可怜相。但他和那些不择手段，丑态百出的江湖派的“山人”、“名士”毕竟是不相同的。清朝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九中说刘过是“纵横之士，志在功名，固不能规言而矩行”，显然是错误的。刘过自己在《方竹杖》诗中说他是“峰棱四面起，节操一生坚……纵教方有妨，终不效规圆”的。他一生的实践也证明了他的说法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对待“和”、“战”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二

吕大中《宋诗人刘君墓碑》说刘过在当时“诗满天下，身霸骚坛”。王世贞《艺苑卮言》说：“词至辛稼轩而变，其源实自苏长公，至刘改之诸公，极矣。”刘熙载《艺概》也说刘过的词“虽沈着不及稼轩，然足以自成一家”。但是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却认为：“改之全学稼轩皮毛，不则即为《沁园春》等调，淫词褻语，污秽词坛。”刘过的词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应该肯定，还是应该否定？我觉得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的去办：“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存门户之见。

翻开《龙洲词》读一遍，首先使人感到这些词充盈着强烈的抗

敌情绪和必胜的信念。例如写于嘉泰四年(1204年)的《西江月》(堂上谋臣尊俎)和写于开禧北伐前的《清平乐》(新来塞北)这两首词,刘过以饱蘸着激情的笔触,分析了敌人的情况、北伐的有利的条件,热烈支持韩侂胄出兵北伐,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北伐的胜利。充分表达了词人恢复中原的壮志豪情和必胜的信念。其他如《沁园春·御阅还上郭殿帅》,在写了将军的雄武、禁旅的军威以后,无限深情地说:“中兴事,看君王神武,驾御英雄。”在祝贺韩侂胄生日的《沁园春》这首词里,他除了歌颂抗战派首领韩侂胄以外,还具体出主意说:“不须别样规模,但收揽人才多用儒。”在另一首《沁园春·张路分秋阅》里,词人在写了威武的军容以后,更激动地表示:“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词人不但相信自己军队的力量,鼓励君王、宰相、将士抗敌御侮,恢复中原,而且出主意,想办法,甚至要亲自跃马持剑,驰骋疆场,杀敌报国了。这种坚强的爱国壮志和坚定的必胜信念,真是溢于言表。

词人这种感情,也表现在《六州歌头·题岳王庙》这首对抗金英雄岳飞的被害,表示深切怀念和沉痛哀悼的词里。这首词是在韩侂胄准备北伐,为激励将士,于嘉泰四年特追封抗金英雄岳飞为鄂王,并“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缪丑’”时,刘过特地写的。它热烈颂扬了岳飞的功绩,斥责了秦桧为首的投降派陷害岳飞、投降卖国的罪恶行径,寄托了作者渴望驱逐金虏、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可是,在这首词里,刘过把岳飞残酷镇压钟相、杨么为首的农民起义也算作岳飞的功绩来称颂,那是颂错了。这告诉我们,刘过的爱国词中也还存在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其次,由于刘过坚持抗敌御侮、恢复中原的主张,因此深受压抑,就连主张北伐的韩侂胄也没有重视他,所以刘过的词里常常出现对达官贵人们的讥刺和怀才不遇、报国无路的愤慨。在《六州歌头》(镇长淮)上片里,词人充满感慨地指出“血战成何事,万户封侯。”下片里就对照着达官贵人们的这种态度,沉痛地指出“笑书生无用,富贵拙身谋”。整首词交织着国事沧桑和个人遭遇的感慨。既讥刺了达官贵人们只汲汲于窃取富贵,置国事于不顾的无耻,也暗示了自己不愿同流合污去谋取这种富贵的高尚情操。在《沁园春·卢蒲江席上时有新第宗室》中,他更是横眉冷对新贵,

鄙夷地说：“谁羨汝拥三千珠履，十二金钗。”在《念奴娇》（知言者少）、《贺新郎》（弹铗西来路）等词里就更清楚地流露了他怀才不遇，报国无路的愤慨。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刘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由于生活圈子的狭窄，他的词就很少反映人民生活、农村情况。相反地却写了不少无聊的游宴词、赠妓词、贺词。特别是他别出心裁写的《沁园春·咏美人指甲》、《沁园春·咏美人足》，的确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说的，是“词中最下品”。而某些封建士大夫却是称赞不已，张炎《词源》卷下说：“二词亦自工丽。”陶宗仪《辍耕录》说：“（刘改之）《沁园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与足者，尤纤丽可爱。”影响所及，元朝人沈景高就有和刘龙洲咏美人指甲词，邵亨贞则因刘过有咏美人指甲、美人足的词，他就写咏美人目、美人眉的词。明末清初的徐石麟甚至写了28首美人词，什么“美人影”、“美人发”、“美人腮”都有。此后也还陆续出现过一些这样的词。这些都可以说是刘过的不良影响。

刘过的词受辛弃疾的影响颇深，他们豪放的风格是相近的，冲破束缚，自由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也是相同的。刘过的《沁园春·寄辛承旨，时承旨招，不赴》是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韩侂胄准备北伐，起用辛弃疾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时，刘过在杭州写了寄给辛弃疾的。这首词风格新颖，想像丰富，摆脱了格律的束缚，用散文式的语言，把白居易、林逋、苏轼三个不同时代而都在杭州住过，与杭州都有过密切关系的诗人，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并利用白居易的《寄韬光禅师》、林逋的《梅花》、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的成句，自然地勾勒出了杭州的湖光山色，表现了辛派词豪放恣肆的特色。这和辛弃疾的《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很相近。在运用古人语言毫无硬搬的痕迹，而且有不尽的馀味这一点上更是相同，所以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说这首词“颇有稼轩气味”。也可能正是这样的缘故，据岳珂《桧史》卷二说，辛弃疾得到这首词，很高兴。这是刘过词的风格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刘过也和辛弃疾一样，还有写得含蓄蕴藉，情味深永的一些抒情小令，如著名的《唐多令·重过武昌》。这首词

虽然与《六州歌头》(镇长淮)的“兴亡梦，荣枯泪，水东流，几时休？野灶炊烟里，依然是貔貅”所抒发的家国之感相比是轻淡得多了，但它写得含蓄、有情致。所以李攀龙《草堂诗馀集》说“读之下泪”，先著《词洁》说是“与陈去非‘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并数百年绝作”，李佳《左庵词话》认为是“小令中工品”，黄蓼园《蓼园词选》也认为“词旨清越，亦见含蓄不尽之致”。总之，像《唐多令》这样的作品，在《龙洲词》里是别具一格的。冯煦《蒿庵论词》认为：“刘龙洲是稼轩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婉转。”是不全面的。

刘过在他的词里，除了运用古人的诗句以外，还大量运用通俗语言。如《沁园春》中的“一日须来一百回”、“一别三年，一日三秋”、“但口不能言心自知”；《祝英台近》中的“一日近一日”；《长相思》中的“窗外芭蕉三两窠”；《浣溪沙》中的“海燕成巢终是客”；《竹香子》中的“料想那人不在”、“这镜儿也不曾盖”；《清平乐》中的“一捻儿年纪”等等，都很接近通俗朴素的人民语言。特别是他的《天仙子·初赴省别妾于三十里头》完全使用口语来写，写得情致缠绵，活泼动人。杨升庵《词品》评价这首词是“词俗意佳”，贺裳《皱水轩词筌》认为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作品。

在词中运用古人诗句，运用通俗语言，这也是辛弃疾的特色，而刘过在运用通俗语言方面更为突出，只是像李调元《语村词话》卷三批评的那样：有“失之粗劣”处。另外，刘过的词也不像稼轩词那样大掉书袋。这些，可以视为刘过词和辛弃疾词的同中之异。

《龙洲词》有龙洲弟刘澥辑本、明朝王朝用覆刻本、钞宋五家词本、毛晋六十家词本及现、当代的《彊村丛书》本、罗振常《蟬隐庐丛书》本、《全宋词》本等数种。此次笺注是以收集最全的《蟬隐庐丛书》本为底本。《龙洲词》不到百首，但我的笺注工作和有关刘过资料的收集工作却花了较长时间，主观上是希望做得好一些。不过，毕竟知识有限，谬误恐仍难免，尚希海内外读者有以教我。

马兴荣

1982年初识于华东师大

1999年改于忆邛庐斋

【注释】

- [1]沈愚《龙洲先生传》，曾蒙简《重过龙洲先生墓下》。
[2]卓人月《草堂诗馀》，清同治《襄阳县志》卷七。
[3]《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
[4]朱熹《戊申封事》。
[5]《龙洲词》：《沁园春·寄辛稼轩》。
[6]《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7]《龙洲词》：《水调歌头》（春事能几许）。
[8]《龙洲词》：《沁园春·王汝良自长沙归》。
[9]《龙洲集》：《题东林》。
[10]《龙洲集》：《谒江华曾宰》。
[11]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八十五《倪公墓志铭》。
[12]《宋史·韩侂胄传》。
[13]周密《浩然斋雅谈》。
[14]《宋史·陆游传》。
[15]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

目 录

前 言	(1)
沁园春御阅还,上郭殿帅	(1)
又题黄尚书夫人书壁后	(3)
又寄辛稼轩	(5)
又寄孙竹湖	(6)
又卢蒲江席上,时有新第宗室	(8)
又寿	(9)
又寄稼轩承旨	(11)
又	(13)
又张路分秋阅	(14)
又观竞渡	(16)
又赠丰城王禹锡	(17)
又送王玉良	(18)
又咏别	(19)
又王汝良自长沙归	(20)
又美人指甲	(21)
又美人足	(22)
又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官	(23)
水调歌头	(24)
又	(25)
又寿王汝良	(26)
念奴娇留别辛稼轩	(27)
又七夕	(28)
糖多令安远楼小集	(30)
又重过江南	(31)

满江红 同襄阳帅泛湖	(32)
又高帅席上	(33)
又寿	(34)
谒金门 次京口赋与歌者侑樽	(35)
又	(36)
贺新郎 平原纳宠姬能奏方响,席上有作	(37)
又春思	(39)
又赠媚	(39)
又游西湖	(41)
又赠张彦功	(42)
又赠邻人朱唐卿	(43)
又	(44)
又荷	(46)
水龙吟 寄陆放翁	(47)
又	(48)
祝英台近	(49)
又同妓游帅司东园	(50)
柳梢青 送卢梅坡	(51)
霜天晓角	(52)
辘轳金井 席上赠马金判舞姬	(53)
四犯剪梅花 上建康钱大郎寿	(54)
长相思	(56)
又	(57)
又	(57)
好事近 咏茶筴	(57)
四字令	(58)
蝶恋花 赠张守宠姬	(59)
又	(60)
临江仙	(60)
又	(61)
又	(62)
又茶词	(62)